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2.05.012

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的生成路径与发展策略

——以汶川“5·12”地震灾后五家社会工作组织^①试点为例*

陆士桢,漆光鸿,徐选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灾后社会工作力量和社会工作组织以一种外来植入性方式介入灾区重建中,并对灾后重建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在四川灾后建立的首批五家社会工作组织试点为例,首先阐述了灾后社会工作组织的植入性内涵及特征,进一步论证了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在灾后重建乃至整个社会建设事业中发挥的成效及其面临的困境,最后对未来我国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策略进行了探索和论证。

关键词: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生成路径;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2)05-0071-06

汶川“5·12”地震发生后,灾区面临着社会重建与精神家园重建的艰巨任务。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和相关人员充分认识到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积极入驻灾区,参与灾后社会重建事业,为灾区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提供了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在灾区重建进程中,各种类型的社工组织逐渐萌生,在四川灾区这片试验地上,寻求着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为中国社工专业组织发展书写了新的篇章。在诸多的组织类型中,最为突出的一支力量是外来专业社会工作组织的积极介入,这种外来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成为灾后重建事业的一大特色。汶川地震发生已近四年,但是灾后重建事业却仍在继续进行。本文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在灾后成立的首批五家社会工作组织试点单位为例,对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发展进行探究。

一、植入性社会工作概念及其特征

所谓植入性社会工作,是指在外来专业社会工作的影响指导及直接介入下发育起来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及其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区别于深圳和上海等地直接在本土发育壮大的专业社会工作,植入性社会工作的发育是在当地各方面条件并未完全成熟,在外来专业力量的支持和影响下,为了应对某种特殊状况或者满足某些特定需求而

① 本文所指五家社会工作组织试点,是指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支持下正式注册成立的灾后首批社会工作组织试点单位,包括:都江堰“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安县红十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资阳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绵竹“青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收稿日期]2012-05-21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协会2011年度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课题(11JG0224)“我国民办社会工作组织评估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陆士桢(1947—),女,北京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儿童、青少年工作研究等。

发展起来的一种专业组织和专业服务形式。

“植入性”不同于格兰诺维特等人的“嵌入性”,嵌入性理论是在“强—弱”关系的基础上,对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结构做出的阐释。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1]与嵌入性的领域类别划分不同,“植入性”是在地域区别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侧重外来力量对本土事务的植入。黄耀明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用“植入”比“嵌入”更具动感、全面和生命力^[2]。我们认为,植入性社会工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 外来专业性植入

“植入”原为生物学中的专业用词,是指胚泡逐渐埋入子宫内膜的过程,包含贴、溶、进入、生长分化和上皮修复几个阶段。我们认为,所谓植入,也即外来物进入当地,并在当地谋求发展的过程。在灾区重建过程中,从社工组织的参与来看,植入主要体现在外来专业力量的介入方面。这些介入包括组织、人员、资金和技术等方面。(1)在组织上,全国性社团、各高校、海外基金会、专业组织等以各种形式参与当地的重建工作。在当地基本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着主导作用。(2)在人员上,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员、专家、督导、机构管理者、专业服务和志愿者基本上都是从外地选派或自愿入驻。(3)在资金上,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主要通过公益项目资助或援建资金获得发展,很少有组织能够直接从当地获得资金支持。(4)在专业技术上,由于当地专业基础薄弱,缺乏专业人员,短时间无法培养出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员,大多数机构都选择了从外地派入专业技术力量,如“青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依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专业力量,“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依托长沙职业民政学院等高校专业力量获得专业技术支持。

(二) 存在特定隐性需求

任何事物的产生,有其偶然性,但偶然中包含必然。外来专业社会工作组织之所以能够成功植

入四川灾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灾区本身所存在的诸多隐性需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我们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社会各个层面急需一种有效机制来化解矛盾,处理危机,社会工作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四川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经济大省,国家发展的大局在四川有明显的体现,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四川人口总数为80 418 200人,成为继广东、山东、河南之后的第四大人口大省,按照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16898.6亿元计算,2010年人均GDP为21013.4元,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近些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四川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建设在四川有着广泛的动力和需求。这些方面表明,四川作为我国西部大省,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潜在矛盾和隐性需求。同时,近些年来,国家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视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推动,以及对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视和探索,这些都为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提供了必然性发展空间。

(三) 借助社会契机,迎合社会需求

如果说四川地区存在的诸多隐性需求是一种植入性社会工作介入其中的必然性的话,那么,地震则为植入性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偶然性契机。“5·12”地震灾害的发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数以亿计的直接经济损失,但是更重要的是,无数家园被摧毁,无数民众处于困境之中。虽然灾后援建工程已经顺利竣工,并对灾区经济重建、社会重建发挥着显著作用,但是灾后重建远未结束。灾后重建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灾害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加剧、官民关系紧张、灾区民众生计无法得以保证、民众精神家园尚未顺利重建等问题,都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重大的课题。与此同时,植入性社会工作敏锐地迎合了灾区各项社会需求,积极介入灾后社会重建事业中,为化解灾后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增进官民有效互动,促进灾区民众生计发展和精神家园重建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处理好外来力量支持与本土力量发展关系是关键

灾后进驻四川的社工组织主要有三种：外来社工组织直接进驻，外来力量协调专业人员进驻后建立组织，以及外来力量直接资助社工组织建立等三种类型。但这三类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一个共同趋势：即培育和发展本土力量。这一方面体现了灾区重建的现实需求以及本土相关条件的支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专业发展对这一趋势的内在影响。为有针对性地当地民众提供服务，社会工作需要注意专业力量的本土化。王思斌指出，本土化是指外来的东西进入另一个社会文化区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3]。所谓本土化，是社会工作服务为适应当前所处的环境以及满足当前需求而发生的变化，通俗地说就是“入乡随俗”，这体现了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取向。因此，要做好本土化，离不开本土力量的培养。由于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对外部依赖较大，而外部支持多是在灾害发生之后采取的紧急援助，无法成为长期的一项工作，因此，当外部资金、技术、人力支持等降低或者消退的时候，这些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就容易面临着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困境。因此，能否处理好外来力量的支持与本土力量发展的关系，是这些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的关键。

二、植入性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成就与困境

进入灾区三年以来，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不断调整角色和定位，改进工作方法和手段，为灾区民众做了大量预防、治疗和发展性的工作，为推动专业发展，服务灾区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这些社工组织的持续性发展也受到了诸多内外因素的挑战。

（一）政府与民众对社会工作重要作用的认知和认可度不断提升

社工组织进驻灾区以后，协助政府安置灾民，安抚情绪，并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和负担。在应对突发事件和社会建设中的遇到的问题时，社工的专业视角也为当地政府提供了新的思路。专业

的社会工作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呈现在了政府官员的前面，让他们意识到了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另一方面，民众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社工用与常规救助不一样的方法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有针对性服务。这些服务在满足他们基本需要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自助的方法和技能，社工的专业性逐步得到认知和认可，他们对于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的认识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服务逐步建立和加深。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为其有效介入社会建设，促进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一席之地。

（二）专业力量与本土力量有效融合，推动了本土力量发展

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要发展，关键在于借助外来专业力量与本土力量的融合。灾后五家社会工作组织试点的发展壮大，凸显了专业力量与本土力量的有效融合，逐步推动了本土社工力量的发展。如都江堰“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成立，首先得益于上海专业社会工作力量的影响和支持，随着上海援建的结束，在都江堰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它与政府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初步实现组织承接政府项目、政府购买组织服务的模式，使中心成为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良好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政府职能转变和职能履行发挥了柔性的功能，促进了官民融合与社会和谐。又如绵竹“青红”社工服务中心的成立，是在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专业教师力量发起，组建了一支具备专业理念和专业技能的工作队伍，同时扎根绵竹实际，培养当地骨干，坚持发展性为视角，初步探索出一条融专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一体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模式，对灾后社会工作介入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运行中起到了较好的开创和示范作用。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也是在外来专业力量的支持和影响下，在湖南援建资金的支持下，不断从专业走向本土，实现了专业力量有效融入理县羌族、藏族较多的民族地区，对培育当地志愿力量，促进民众生计发展起到显著作用。

（三）五家组织各具特色，共同探索社会工作组织多元化发展模式

虽然同为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但因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五个社会工作试组织点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种探索,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工作事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如:都江堰“上善”社工服务中心最大的特点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基本成型;它争取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与认可,建立了让政府出资购买上善社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机制。这对处于中国特定社会发展状态下,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来说,具有显著的创新意义和开拓价值。

资阳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最大的特色在于将自身服务嵌入资阳市党委政府的社会服务体系中。它与政府关系密切,得到政府的积极认可,在人员和项目上实现了政府购买机制。该中心主动帮助党委政府有效回应群众需要,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创造了社会工作服务开展的外部健康环境。资阳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把政府搭建的行政化平台和社会组织的社会化运作模式相结合,把传统的行政运作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手段相结合,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形成了社会工作全面介入社会建设的发展机制。资阳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模式,在全国社会工作组织介入社会建设方面有示范作用。

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的特点在于外部政府的支持以及民族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该中心是四川地震灾后,作为湖南省对口援建理县的规划项目之一,中心从场所的建设到相关工作人员的聘任都纳入到了省财政厅援建理县经费规划之中,成功地实践了政府购买服务。该中心的社会工作服务在理县藏、羌民族地区得到较好的推广实践,服务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工作服务得到广泛、有效的实践和运用,探索出了社会工作介入欠发达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模式。

安县红十字社工服务中心属于社会组织体系内的社工组织。它依托于安县红十字会,力求鼓励社区居民生产自救,增强其社会功能,应对震后生活和生产环境的变迁;协助社区居民挖掘和利用自身资源、培育和发挥自身能力,恢复自信,建立希望,投入生产,开始新的生产、生活,恢复正

常、和谐的社会生活。它以学校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为重点,服务地震灾区青少年儿童,为灾区青少年儿童探求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提高灾区青少年儿童面对灾难、抵御灾难、不怕困难的能力,逐渐使灾区青少年儿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中,并达到与社会的良好适应状态。这是我国社会工作与红十字会有效联结的重要创新。

绵竹市“青红”社工服务中心的特点在于高校专业力量与本土纯民间力量的有效融合,探索了适合欠发达地区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所需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模式。它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的专业力量为依托,不断挖掘本土人才,培养社区骨干人才,积极探索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与本土力量的有效融合,保证了组织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专业化基础和长效性机制。

(四) 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虽然每个组织发展都有一定的特色,但是也都面临着诸多问题,影响着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支持问题。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工作要发展,组织要获得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就离不开政府的强有力支持^[4]。同样的,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在当地的发展必然要面临政府支持的问题。政府的支持一方面是组织身份的认可,另一方面则在于资金的支持和政策的保障。两者直接决定这些组织的生存,当某一天政府的支持终止或减弱,这些组织还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确实令人担忧。

其次,组织自身的运转能力。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除了外部的支持外,自身的能力尤为重要。能否保证组织的专业性,保证所有人能严格尊重专业操守,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针对性的专业服务,是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部分。上述五家机构中,部分机构具有较为明显的可持续发展优势,但是一些组织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如部分组织资金链断裂、政府认可程度和支持力度不大、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不足、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方面,使得组织持续发展缺乏长效性

和保障性,这些都要靠组织本身去争取。

最后,民众的接纳程度。社会工作应该扎根中国社会实际,尤其是灾后社会建设的现实。灾后五家社会工作组织有的是外力推动下开展服务,有的则是在外力与本土结合融合的基础上进行实践的。但是,总体上,灾后社会工作介入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模式尚不成熟,民众的接纳程度还不高,专业化与本土化的结合还在探索之中,服务实践过程中尚未发挥本土优势对社会工作服务的积极吸纳作用,社会工作的实践真正符合民众内在需求等方面还有很大空间。这需要良好机制的建立。

三、我国植入性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思考

为应对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所面临的困境,促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应该积极探索协助政府完成社会管理创新职能的路径和方法,抓住民生之本,坚持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结合,稳步发展本土社会工作服务组织。

(一)推动社工协助政府创新社会管理职能是首要任务

社会工作有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的区别。要做好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工作,必须在三个层面同时下工夫。

宏观方面,需要构建良好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积极参与政府的社会管理事务。在2011年2月19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时,更加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5]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应该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契机,不断探索获取政府更大支持的方法与途径,积极发挥民办社会服务

组织作为政府助手的作用,保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摸准政府社会建设中心工作,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中观方面,要主动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各组织之间的合力,共同为政府助理,搭建政府与民间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合作互动的良好平台。微观方面,必须努力提高组织自身的能力,只有具备了承担政府部分职能的能力,才能真正构建起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机制。这是发展我国社会工作,尤其是发展灾后社会工作的根本和关键。

(二)抓住民生之本,重视生计发展是根本之道

灾区震后面临着多层次的问题,生计问题首当其冲。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应该及时把握灾后社会重建进程,立足民众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回应民众发展根本需求。要深刻把握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问题,抓住民生之本,将生计发展纳入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战略体系之中,立足灾后民众根本需求,坚持以生计发展为主线和主要路径来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要把民众内在发展需求与社工服务组织的发展一致起来,这是灾后社会工作有效介入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

(三)加强专业性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是关键举措

针对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可持续发展困境,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应该在重视专业化的同时,积极探索本土化模式,借助本土力量的优势,有效促成专业化与本土化双重力量的融合。这是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建设中的有效途径。“青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放眼绵竹灾后现实,深刻洞察本土力量对成功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有效促进组织机构发展的重要性。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挖掘本土人才,培养社区骨干人才,积极探索将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力量的有效融合。资阳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都江堰“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分别通过各自的努力,或嵌入体制,或争取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均有了在本地长期发展的可能。

(四)稳步向本土社会工作服务组织转向是重要保障

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是在地震发生以后为应对灾区特殊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应急组织,组织的

持续性发展有赖向本土化社工服务组织的转型。推动本土化的社工服务组织稳步发展,离不开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自身整合资源的能力,建立结构合理的服务团队,以及专业的支持和督导。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促进本土社会工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一是应该充分利用灾区重建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契机,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身份认定、服务承接和人员购买等方面,借重于政府。二是要积极争取到政府、行业协会、基金会、企业及相关组织的服务项目,力求有带资金的项目,以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要努力发展新的项目,有争取项目的的能力,实现组织的可持续。三是组织内部人员结构要搭配合理,要建设一支以专业服务人员为主体,高素质行政工作人员为保障的服务队伍。四是要积极寻求专业支持,借助驻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业优势,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参加相关业务培训,建立健全督导制度。五是组织的生存离不开场地、设施、物资等基本的保障。要有长远的眼光,建设高专业水

准的服务场地和工作场所,建立设备设施使用和保管制度,提高物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 [1] 马克·格拉诺维特. 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EB/OL]. 社会学视野网, [2010-10-12].
- [2] 黄耀明. 论“陌生人”社会中社会工作的专业植入[J].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36-39.
- [3] 王思斌. 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 浙江学刊, 2001(2):56-61.
- [4] 陆士桢, 徐选国. 我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发展现状及策略分析(下)[J]. 中国社会工作, 2012(3)上:31-32.
- [5] 胡锦涛.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02-19].

(责任编辑:杨 睿)

Generation Pat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Implanting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Taking the Experiment of Five Social Working Organizations after Disaster as an Example

LU Shi-zhen, QI Guang-hong, XU Xuan-guo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post-disaster social work force and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re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area through a foreign implantation method an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after disaster of Wenchuan 5.12 Earthquake. Taking an example of fiv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experiment established after Sichuan earthquake by China Social Work Associat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lantation of post-disaster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furth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implanting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area and in the whole social construction cause and their difficulties and, finally, explores and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mplanting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mplanting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generation path; social management